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王裕明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关键词: 徽州商人; 经济结构; 徽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 K244;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5)03-0123-06

On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ANG Yu-ming

(College of History &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ere still very active. Huishang originated in the Song Dynasty, Britain in Yuan Dynasty. The reason of rising of Huizhou merchants were decided by economic structure, neither geography nor cultural. The merchants' activity caused commercializ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Huizhou.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ere professional traders, its activity arned many profits, changed occupational outlook, formed Huizhou model, was a basis of Huisha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 economic structure; Huizhou model

笔者在翻阅徽州家谱时,发现数十条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资料。现根据这些资料,结合已有研究^①,分析宋元徽州商人的基本面貌、主要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一、基本面貌

宋元时期,徽人经商从未间断。北宋时,已有歙县苏村方桂、柘源方细二、联墅方行文、棠樾鲍彦荣、西溪南吴文用、大阜吕乙公和休宁宣仁王志大等 10 余人。生于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的方桂,“承父遗业,服贾清溪万年镇”^②。天圣元年(1023),方桂自苏村迁居淳安邦源。又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王志大,“比领郡椽薄归就贾,斋用日饶”^③。南宋时,徽人经商

渐多,有歙县大阜吕正甫、洪村洪贵一、桂溪项时义、岩

^①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46 页;[日]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宋代徽州商业的发展》,载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 1987 年版,第 1—18、227—233 页;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 年第 4 期。

^②《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12《余坡分派世系》,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卷 9《谱传》,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镇吴宁一、荷花池程大器、休宁古城程汝翼、云山洪礼、婺源岩田李崧和庆源詹泰等 20 余人。其中洪贵一,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卒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游商江湖,货殖蕃茂,货产益饶,与弟友爱,尤笃不分爨,乡閭称为孝友”^①。又詹泰,生于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商淮,歿葬舒城上阳镇周公渡”^②。元代徽州商人进一步增加,有郡城程文广、歙县荷花池程邦礼、长陔毕仁、棠樾鲍饶、澄塘吴俭、岩镇汪德兴、休宁古城程午、断石村韩庆七、藏溪汪景新、率东程观保和坑口孙庆师等 50 余人。其中程邦礼,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卒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几三十,遂隐于商,至元大德元年,总管郝思义以名荐不屈”^③。汪景新,生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卒于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自少奋志,贸易江湖,不避艰险”^④。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地域十分广泛,既有经商于歙县岩镇、休宁渠口等徽州本地的,也有经商于宁国旌德、浙江杭州、浙江衢州和江西信州等周边地区的,同时也有经商于两淮、福建、广东、广西、两湖、四川、山东、河南北京以及陕西等远途地区的。经商于徽州本地的有歙县棠樾鲍昌孙、桂溪项三二和婺源金竹程起聘等数人。其中程起聘,“贸易(休宁)十四都。叶轩公见其纯笃,器重之,义女妻焉”^⑤,遂买田筑室,自婺源金竹迁至休宁居安。经商于周边地区的有歙县大阜吕孔玉、桂溪项懽、项达卿、项十公、项少穆、毕奇泰、联墅方行文、棠樾鲍饶、苏村方桂和休宁古城程汝翼等 10 余人。吕孔玉,生于南宋祥兴年间,“商于旌”^⑥。经商于远途的则多达 50 余人。其中经商两淮的,有吴庆、歙县方千、荷花池程大器、长陔毕仁、岩镇汪德兴、桂溪项傅、项己、项周、项全、项克绍、项禅保、项涇、休宁云山洪烈、洪丞、古城程元成、程元有、程元圭、坑口孙全和庆源詹泰等 20 余人。如项周、项全,为项智两子,“并商于淮,不归”^⑦。经商湖广的,有棠樾鲍叶、澄塘吴善阴、月潭朱真、婺源江湾江松和符村汪会等数人。如朱真,“商游侨居于楚”^⑧。经商闽广的,有歙县方细二、方伯一、澄塘吴义、吴思义、吴景、桂溪项通、项禄保,休宁西门汪谊和婺源岩田李以瑶等 10 余人。如生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汪谊,“从商福建,尝写其真寄归,复往广西,遭值世变,没于彼”^⑨。经商于山东的,有歙县澄塘吴俭和休宁率东程观保等数人。吴俭,生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因商济南,回没于信州王家渡”^⑩。此外大阜吕正甫、吕楹经商于芜湖,歙县桂溪项廷茂经商于金陵,云山洪礼和祁门楚溪汪明德经商于镇江,歙县桂溪项良经商于常州,草市孙肇三子经商于秦陕,歙县蒋宗元经商于北京,休宁和镇戴亨经商于四川,歙县桂溪项才经商于两浙、两淮和河南等地区。如汪明德,“经营瓜州,尝贷白金三十

两出人于死,不责偿。遭元明鼎革,与二弟奉二亲避乱于黟”^⑪。又孙肇三子,元末“商游秦陕忘归”^⑫。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主要经营茶、木、盐、典、酒、染等业。经营于茶业的有歙县嘉田毕天祥和毕仁父子、桂溪项少穆和项才。生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卒于洪武十八年(1385)的毕仁,“迨年十六,贸迁有无,以货茶往淮之庐州东阳镇,设肆而坐贾焉。每岁天祥翁运茶以引计者数百,稔寓于其所,终年而餐,获利恒数倍于本。”^⑬经营木业的有婺源岩田李崧。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3),李崧“设策江湖以避之,出为木商”^⑭。经营盐业的有歙县岩镇汪德兴、荷花池程大器和桂溪项才。程大器,“两淮守支,尝举百金犒伐金之师,恭慎勤劳”^⑮。经营典业的有歙县棠樾鲍彦荣和联墅方行文等。方行文,生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卒于绍熙三年(1192),于“淳安县东郭街北关开质库”^⑯。经营粮食业的有歙县棠樾鲍饶,“尝客游杭州,交结贤达,以米商起

①《洪川洪氏宗谱》卷 2《歙南洪村世系》,民国二十七年(1938)刻本,美国犹他家谱中心缩微。

②《庆源詹氏宗谱》卷 1《义居公支派》,清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③⑬《新安荷池程氏家谱》不分卷,明万历年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卷 4《世系》,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⑤《休宁北村程氏族谱·世系》,清康熙间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⑥《新安吕氏续修宗谱》卷 1《渭公迁歙世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刊万历五年(1577)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藏复制本。

⑦《歙县项氏族谱·小传》,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⑧《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 3《十六世和公支》,民国二十年(1931)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藏复制本。

⑨《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 9《九承奉图一》,明嘉靖六年(1527)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⑩《歙县澄塘吴氏家谱》卷 3《澄塘世系》,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⑪《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 2《文献》,清宣统二年(1910)活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⑫《率东程氏家谱》卷 3《十一世维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⑬《新安毕氏族谱》卷 9《仕宦志》,明正德四年(1509)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⑭《星江岩田李氏八修宗谱》卷 1《家传》,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活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⑮《方氏族谱》乐部《子寿公支派》,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抄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家并立产业,年五十余,卒于杭州”^①。经营酒坊的有歙县桂溪项十公,于“衢之开化,地名龙山开酒坊”^②。经营染坊的有歙县桂溪项三二,“戊戌生,娶城居贾氏小姑,开染坊,有一女二男”^③。此外,元代歙县桂溪项赵保,“赀财泛海,死于非命”^④,似乎从事海外贸易。又两宋之交,歙县桂溪项才,“素富于财,贩茶盐于浙右”,不仅贩卖茶业,而且经营盐业,属于兼业性商人。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已十分活跃。从活动时间来看,自北宋仁宗年间至元末,经商不辍,日益活跃;从活动地域来看,已走出徽州,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以远途为主,其中两淮和闽广为重点,同时出现跨域经营;从经营行业来看,以本土茶木为主,兼营本土需求的粮典,并开始转营盐业和海外贸易。

二、主要特点

(一) 经营商品以徽州本土物产为基础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经营行业主要为茶、木、盐、典和粮食等。其中,茶、木应为徽州本地物产。徽州山多田少,茶林种植广泛。两宋时期,徽州人已将茶、木等物产运至浙江、江西一带销售,“木则松、梓、槻、柏、栲、榆、槐、檀,赤白之杉。岁联为桴以下淞河,大抵松、杉为尤多,而其外则纸、漆、茶、茗以为货”^⑤。其中,休宁和歙等县茶木顺着新安江而下销往浙江,祁门等县茶木则顺着昌江而下销往江西。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淞河,往者多取富。女子始生则为植杉,比嫁斩卖以供百用”^⑥。歙县同样如此。南宋乾道年间,“歙浦杉排,毕集桥(严州浮桥)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⑦。至于祁门,则“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⑧。元代,徽州人仍以茶木置换生活生产物品。所谓“摘茶贸食民尤窳,掘厥烧畚土不闲”^⑨。与此同时,徽州茶木贸易日益繁盛,并开始远销大江南北。对此,徽州文人方回有过生动描述:“厥土最宜杉,弥岭亘冈麓。种杉二十年,儿女婚嫁足。杉杪以樊圃,杉皮以覆屋。猪圈及牛栅,无不用杉木。联筏下浙河,善价不轻鬻。山高高至天,蕪灰艺番粟。又有茗苑利,商贩给南北。”^⑩

宋元时期徽州茶木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徽州商业的繁荣,吸引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南宋年间,即有福建商人来徽州经商,在一次卖给商山人吴舜选的物件中,不慎遗落数十枚金牌。次年,该闽商再至徽州,吴舜选便将金牌原数奉还^⑪。随着商业的繁盛,徽州一度出现了“岁四月八日,四方民谄五显神,为佛会,天下商贾辏集”^⑫的场面。徽州茶木贸易的发展,还带动本土人的经商热情。北宋末年,朱元经营茶业,适逢蔡京改革茶法,被诬私贩茶叶,获罪下狱^⑬。前述项才“以货往京

口,泛扬子江”,其子士汴即生于“往来汴河泗扬之间”的茶船之中。毕仁在庐州东阳镇开设茶店,专售徽州本土茶叶。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在经营本土物产过程中,不断熟悉商情,相机转营其它行业,逐渐改变徽州人的职业观,从而促成徽商的兴起。这说明,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徽州茶木经济是徽商经营的根本。这也是清代乾隆以后随着盐典商人的衰落,徽商开始由盛转衰,茶木商人再度成为徽商的中坚、支撑着徽商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 长程贸易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地域,除徽州本土及周边地区外,更多的是活跃于两淮、福建、广东、广西、两湖、四川、山东、河南、北京以及陕西等远途地区。这些地区距离徽州远近不一,经商路线亦不尽一致。如经商湖广的,“出鄱阳,过九江,望荆湖之墟”^⑭。经商扬州的,“舟行,自西门汎溪胜二百石,沿新安江而下百二十里,以出于境,由淳安至严州,历桐庐、富阳过浙江,入临安府,又经崇德至秀州,经吴江至平江府,经无锡至常州,经丹阳至镇江,过扬子江至扬州”^⑮。经商于北宋都城的,从徽州府城出发,历经江南东路宁国府太平县、池州大通镇、淮南西路无为军庐江县、庐州、寿州、淮南东路亳州鹿邑县、京畿路开封府太康县、咸平县,最后至开封,“往往不过都历邑者,商旅之所以为径易也”^⑯。

①《棠樾鲍氏三宗族谱》卷22《世系》,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③④《歙县项氏族谱·小传》。

⑤淳熙《新安志》卷2《物产》,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19页。

⑥⑧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第7604页。

⑦范成大《骞鸾录》不分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4页。

⑨方回《桐江续集》卷1《送慵庵不及用韵奉寄》,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6页。

⑩方回《桐江续集》卷15《溯行回溪三十里入婺源县界》,第403页。

⑪《商山吴氏族谱》本宗图系第2《小传》,明成化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⑫程敏政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5《饶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76页。

⑬洪迈《夷坚志》甲志第9卷《邹益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2页。

⑭程敏政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9《伯会先生汪公行述》,第2185页。

⑮⑯淳熙《新安志》卷1《道路》,第7608页。

实际上,徽州至开封路线共有 3 条,陆路 2 条,水路 1 条。3 条线路,从方位上看,又分为中、西、东。上述线路不过是其行程最短的西路。中路从徽州府城出发,历经江南东路绩溪、宁国府、太平州、淮南西路和州、淮南东路滁州、泗州、宿、亳州永城、京东西路应天府南京谷熟、宁陵、拱州、京畿路开封府雍丘、陈留,最后至开封,行程 2065 里。东路自徽州府城出发,历经两浙路淳安、严州、桐庐、富阳、临安府、崇德、秀州、吴江、平江府、无锡、常州、丹阳、镇江、淮南东路扬州、高邮军、宝应、楚州、淮阴、虹、灵璧、宿州、永城、京东西路应天府谷熟、南京、宁陵、拱州、京畿路开封府雍丘、陈留,最后到达开封,行程 3092 里。3 条线路远近不一,长则 3000 余里,短则 1600 里;横跨区域亦不尽相同,涉及江南东路、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京东西路和京畿路。尤其是徽州至开封所经地区,亦为徽州商人的活动范围。其中,两浙的杭州、平江、镇江和两淮的扬州、淮安、庐州,为徽州商人的活跃中心。况且,从开封出发,徽州商人还可进一步北上晋冀、西进秦陕。

长程贸易是短途贸易的延伸,也是短途贸易发展的结果。从空间来看,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经历由近而远、由小而大的渐进过程。始于集市贸易,进而拓展周边市场,最后走向全国市场。显然,宋元时期,徽州商人长程贸易,突破了商于本土的范畴,突破了“为买而卖”范围。前述的元代毕仁在庐州茶店年销量达数百引,按元代茶叶每引为 90—120 斤计算,数百引就是数万斤。数万斤茶叶,不会是自产自销,应是收购众多茶户生产的。文献对毕仁茶店年销量记载或许有所夸大,但毕仁属于专业茶商应无疑。这说明,宋元时期的一些徽州商人,已经成为真正的专业商人。

(三) 商人籍贯以休东南歙西为主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主要为歙县、休宁、婺源和祁门等县之人。具体说来,歙县的有府城、坤沙、澄塘、西溪南、岩镇、上路口、槐塘、棠樾、柘源、长陔、洪川、联墅、桂溪、荷花池、苏村和大阜等。休宁的有西门、柳塘街、宣仁、断石村、古城、方塘、和镇、北村、率东、坑口、藏溪、云山和月潭等。婺源的有江湾、庆源、符里和严田等村,祁门的有楚溪村。各巷村所在方位及所属乡都如下:

歙县。上北街,郡城,属于东北隅;坤沙,县西三十里;澄塘,县西三十里;西溪南,县西三十五里;岩镇,县西二十里;上路口,县西二十里;槐塘,县西二十五里;棠樾,县西十五里;柘源,又称马岭,县西三十里;长陔,县南七十里;洪川,又称洪岭,县南二十里;联墅,县西二十里;桂溪,又名小溪,县南五十里;荷花池,县南四十里;苏村,县东北七十里;大阜,县东北三十里。休宁。西门,在县城忠孝乡西北隅;柳塘街,在县城忠孝乡西北

隅;宣仁,在县城忠孝乡西南隅;断石村,在县南二里许;古城,在县东十里;方塘,在县西三十里;和镇,在县西五十里;北村,在县东南二十里;率东,县东四十里,又名由溪、牛坑;坑口,又名云溪,在县南四十里;藏溪,在县南五十里;云山,又名洪家山,在县南十五里;月潭,县南四十里。婺源。江湾,县东七十里;庆源,县北七十里;符村,县南五十里;严田,县西七十里。祁门。楚溪,县南三十里。

由上可知,资料所见 92 位商人来源于 4 县 35 村。其中,歙县 17 村 64 人、休宁 13 村 21 人、婺源 4 村 6 人,祁门 1 村 1 人。这说明,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来源于歙休两县。歙县的 17 村中,位于县西、南的有 14 村。休宁的 13 村中,位于东南部的有 6 村。此即说明,宋元时期徽州商人主要来源于歙西、南与休宁东南。

三、社会影响

商人的活动对宋元徽州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 加快徽州物产商品化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使得徽州物产进一步商品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种类不断增多,二是商品数量不断增加。就商品种类而言,除前文提及的茶木物产外,徽州的毛竹、纸和果类等物产也日渐商品化。徽州盛产毛竹,用途很多,不仅用于房屋建筑,而且可以制作竹席和竹器。宋元时期,一些婺源、祁门商人曾将竹木运往鄱江及淮东、真州等处贩卖^①。徽纸,利用楮木、竹子所造,纸张轻薄、耐用、质量高、实用性强,一经问世,便深受好评和欢迎。宋元时期,徽纸被“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②。徽州盛产梨、柿、“桃、李、梅、杏、含桃、来禽、枇杷、胡桃、安石榴、橙、橘、柚”^③等果类,宋元时期,徽州果类不断贩至外地,且数量不断增加。徽州物产的商品化,从徽州商品税额可以略见端倪。茶课,北宋嘉祐年间的 38 万缗发展到宣和年间的 200 万贯(一缗等同一贯),70 年间增加 4 倍多。竹木课,元代前期为中统钞 210 锭 40 两,其后“排年递增”,至皇庆二年(1313)为中统钞 4180 锭 44 两,增加达 18 倍之多^④。

(二) 促进徽商的兴起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并没有随元明鼎革而中断,反而是更加活跃。有关明代前期徽州商人的记载,

^{①④}弘治《徽州府志》卷 3《财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 1982 年版。

^②费著《蜀笺谱》不分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245 页。

^③淳熙《新安志》卷 2《物产》,第 7620 页。

可谓不胜枚举。如商山吴氏,在明初开始外出经商。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卒于永乐十五年(1417)的吴清,“洪武初,有司以人才举,力辞不就,锐志经营,贸迁淮浙,利于木盐,虽财殷产厚,甲于一乡”^①。尤其是,不少徽商家族子孙相继,形成典型的商人家族,如徽州毕氏,歙县棠樾鲍氏,休宁商山吴氏、草市孙氏和溪东孙氏等。休宁溪东孙庆师家庭即是典型一例。孙庆师(1323—1374)在蒙元时期开始经商,“安于生理,商游江浙”。庆师生有4子皆经商,长子德洪(1356—1440),“平生商游闽浙江淮”;次子德牛(1360—1415),“务农商”;三子德同(1363—1439),“好游江湖,积有饶裕,增产倍先”;四子德添(1373—1437),“壮时尝贸易于江湖”。庆师诸孙中,经商者也大有人在。其中,德洪次子宗质(1388—1426),“贸易江湖”;德洪四子宗方(1405—?),“贸易江湖”;德牛三子宗秩(1396—1465),“商吴楚江淮”;德同季子宗齐(1401—1466),“商游于北”;德添子宗本(1401—?),“壮游闽浙气沓”。明代中期,庆师玄孙中,经商人数更加壮大,德洪之孙、宗文长子闾(1408—?),“景泰乙亥商浙而卒”;宗质季子闾(1389—1462),“商游淮齐”;宗然长子问(1417—1462),“商淮浙”;宗芳长子闾(1426—?),“江湖间卓有佳誉”;宗芳次子闾(1429—?),“商浙东淮北,人多称重”;宗芳季子闲(1432—?),“生殖江湖”;宗厚次子怀(1422—?),“商游宣浙”;宗仁次子悻(1436—?),“纵游江浙,人多爱重”;宗秩次子霖(1436—?),“商齐鲁”;宗茂次子伋(1416—?),“先商东鲁,后贾屯溪”;宗本次子霁(1430—?),“商游浙沚”;宗本三子霁(1431—1457),“好殖产,游齐浙间”;宗本四子霁(1437—?),“善于贸易”^②。自蒙元至明代前中期,溪东孙氏商业经营从未间断,经商人数持续增加。可见,明清徽商与宋元徽州商人一脉相承,徽人外出经商并非始于明代前期而是在此之前。在元代,徽州部分地区已经逐渐形成经商风气。休宁“东南自元以来,家皆逐末农商为业”^③。“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④。元代徽州休、歙两县经商风气的形成,不仅与元代商风靡行密切相关^⑤,而且也是元代徽州商人活动的结果;休、歙两县商风形成之后,不仅没有随元明鼎革而消退,反而延续下去并逐渐扩大强化。元代徽州一些地区商风的形成,应是徽商兴起的重要标志。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在经商中,多能获利而致富,成为乡里富家。如北宋时期,歙西溪南吴文用,“经营贸易,贲产雄于乡里,屹为大家”^⑥。南宋时期,朱熹外祖父祝确,“世以货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⑦。元代歙县澄塘吴义,“侗傥有大志,以道义起家,产至巨万,富声雄于郡

邑”^⑧。徽州商人在因商致富的同时,摆脱了自身贫穷,却拉大了徽州社会贫富差距。元代毕仁经商致富,同宗却不乏“贫乏”者,其佃仆也多有“无依”者。又歙县岩镇吴元甫,“节嗜欲,善于货殖,而家贲盈厚”,而一些徽人却沦为他的“僮妾仆隶”^⑨。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徽州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成为地方乡绅。吴松甫,每遇乡里纠纷,“有司者莫能解者,得公言即解去”^⑩。又元代婺源江湾江松,“与伯父贾楚”,“遂以富饶甲一乡。元季兵乱,公出家贲,募义兵勇数千保障,署义兵万户事。”^⑪江松能够招募义兵,保障乡里,担任义兵万户,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俨然为一方领袖。

(三) 人口流徙频繁

学界大多关注宋室南渡中原人口流入徽州,而忽视徽人的外迁。宋元时期一部分徽州商人经商不归,迁居于外。如婺源李世崧,“于信州至上饶北乡南山下,喜其山水俊秀,地多树木,遂寓居于此”^⑫。又两宋之交,歙县柘源方细二和方伯一父子“商游居福建福州府”^⑬;休宁云山洪栢第三子洪熙和四子洪蒸,“商于淮,遂居淮”^⑭。又南宋末年歙县上路口方千,“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⑮。又元代休宁古城程元成,“同弟有、圭商淮西,元兵渡江,没于虏”,元有“因兄陷虏,遂奉母归。母

①《商山吴氏族谱》本宗图系第3《小传》。

②《新安迁通孙氏家乘》卷2《世系》,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新安毕氏族谱》卷9《仕宦志》。

④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

⑤据学者研究,元代东南地区经商之风靡行,进而形成盐商和海商专业商人,以及江右商人、徽州商人、湖南商人、江浙商人和闽广商人等地域商人集团。见王秀丽《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⑥《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唐仲实叙》,清嘉庆十二年(1815)吴元照抄本,河北大学藏。

⑦程敏政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91《记外大父祝公确遗事》,第2256页。

⑧《歙县澄塘吴氏家谱》卷3《澄塘世系》。

⑨《新安岩镇吴氏族谱·元故处士吴宁一公行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⑩《新安岩镇吴氏族谱·元故处士吴宁三公行述》。

⑪《萧江全谱》仁集1卷《世系》,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⑫《星江岩田李氏八修宗谱》卷1《家传》。

⑬⑭《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14《柘田派世系》、卷5《环岩派世系》。

⑮《云山洪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卒,复之淮,子孙遂家桐城邑北古塘。”^①宋元时期徽州人迁外者甚多,有的虽然没有言明外迁原因,实多与经商有关。如两宋歙县桂溪项氏即有多人迁至两淮,其中,项才之子项念一迁居淮地;愷之次子处恭,“绍兴甲戌,随妇翁挈家往舒州(安庆太湖)居”;四子处度“迁淮安”;愷之之孙、处益长子日修和次子日裕“迁淮”,三子日森“宋绍兴丙子迁太湖白石山”;愷之之侄、项恽之长子项四、次子项五和三子念六“迁淮安”;又项仪长子棕之迁淮南,次子慎之迁湖广罗田县市,三子惟之迁北岸,四子慥之迁淮南^②。同样,云山洪氏自唐迁至休宁,至南宋绍兴年间,“子孙宦游商艺不一,遑遑徙居他郡者,若天中、太原、洛阳、晋陵、永兴、始安、彭城、东鲁、武林者,有迁于蜀郡、羊城、晋阳、豫章、鄱阳、浮邑、歙州、婺州、赤城、古黟者,有居于闽中、楚黄、宛陵者”^③。其中,洪栢次子洪烈“迁居闽地”;五子洪娃“居宣州”^④。南宋淳熙年间,徽州人“多徙舒、池、无为界中”^⑤。

(四) 形成宋元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

徽州在汉晋隋唐时期不断开发,人口亦持续增长,但人地矛盾尚不明显。唐代,徽州一度称为富州。五代时期,徽州赋税陡然增加,经济压力开始增大。至宋元时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地矛盾渐显突出。对于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徽州是如何来解决的呢?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宋元时期徽州人地矛盾是通过山村性开发来解决的^⑥。所谓山村性开发,就是以劳动集约和商业化两种形式并存,借以商业化来弥补劳动集约效益的不足、克服徽州地区自然方面的劣势。劳动集约,就是加速土地开发,大力发展水利设施,改良稻种(如培育出不同品种的早熟占城稻),改变徽州土地不适宜种植水稻的缺陷,提高粮食产量,满足本地的粮食需求。商业化,就是由于徽州的自然条件太差,农民的辛勤劳作和集约式耕作方法,仍取得较低的收益,多数州人不得不放弃粮食种植而逐渐转向商业化农业或非农行业,如将茶、漆、木材和纸等地方产品,运至浙江、江西等地,以换取稻谷、牛、鱼等徽州所需生活生产物品。斯波义信所言不假,不过,按其所言,宋元时期徽州经济类型,仍是保持在利用本身的资源禀赋,换取必需的生活物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买而卖。这种经济类型,仍处于谋生阶段,本质上仍属于小农经济层面。实际上,宋元时期,徽州人已经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开始经营商业,除出卖本地物产外,还经营其他行业,经商逐渐成为一种职业选择,经商的目的不仅仅是谋生,更多的是求富。故而,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因商致富,不仅能够摆脱家庭经济困境,还能够保持徽州经济持续发展,由此形成宋元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结 语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自元代以降,徽人经商观念逐渐深入,经商风气逐渐形成。徽州经商风气的形成,应是徽商兴起的标志。由是观之,徽商当萌芽于两宋,兴起于元代。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文化因素,而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宋元徽州商人一脉相承,并在宋元徽州商人基础上,不断壮大,走向鼎盛。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利用丰富的茶林资源,不断开拓市场和熟悉行情,在经营茶木的同时转营盐粮等业。茶、林经济是徽商兴起的基础,茶商、木商是徽商的根本。清代乾隆以后,徽商开始由盛转衰后,茶商、木商仍十分活跃,再度成为徽商的中坚,支撑着徽商的发展。

宋元时期,徽州人利用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通过商业经营,获得大量利润,不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缓解了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保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因此形成了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11&ZD094)和安徽省博士后资金资助项目(2013)“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秩序——以家谱为视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裕明(1969—),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卷3《世系图三》,明隆庆四年(1570)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桂溪项氏族谱》卷3《桂溪各门派提纲》,清嘉庆十六年(1811)木活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④}《云山洪氏家乘》不分卷。

^⑤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第7604页。

^⑥[日]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和《宋代徽州商业的发展》,载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1—18、227—233页。